

劉家謀的《觀海集》

翁聖峯

《觀海集》的再現

— 劉家謀的《觀海集》 —

劉家謀在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調任臺灣府訓導，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作《海音詩》，咸豐三年夏天病卒於任內。他的《海音詩》七絕百首對清代中期臺灣的社會文化有深刻的描寫，常為歷來的研究者所重視及引用。咸豐五年《海音詩》刊印，韋廷芳盛讚劉家謀「一切地方因革利弊，撫時感事咸歸月旦，往往言人所不敢言、所不能言」（註一），韋氏更稱《海音詩》為「黃鐘、大呂之音，不作錚錚細響。」也許有人會質疑：「刊印先賢典籍多幾分溢美之辭乃勢所難免」，不過，我們如果看五、六〇年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三〇九種明清臺灣史料，《海音詩》列於第二十八種，同時也是所刊印的明清臺灣詩集的第一種，亦可見其受重視之一端。

《觀海集》與《海音詩》同以臺灣為描述主體，但是，《觀海集》的流傳就沒有如《海音詩》的幸運，直至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出版的《重修臺灣省通志·藝文志著述篇》尚且稱「本省終未見有傳本，故其內容亦無從窺知。」（註二）

近日，筆者有幸獲得「咸豐戊午刊」（一八五八）《觀海集》影本，除撰述本文，分析《觀海集》的特色與價值，並複印此書影本暨編訂目錄致贈國內重要的本土文獻機構，希望對吾人研究清代中期臺灣社會文化及文學史有所助益。

《觀海集》的大要

咸豐二年夏秋之際，劉家謀臥病連月，不出戶庭，《海音詩》即作於這幾個月之間。就寫作的時間來看，《觀海集》與《海音詩》頗有不同，《觀海集》可以說是劉家謀在臺灣的詩歌隨筆，寫作的時間始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止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前後共達四年，不似《海音詩》集中在幾個月內完成，而且是有計劃而又完整的百首創作（註三）。《觀海集》雖係詩歌隨筆，然而在不經意、自然情境寫下的作品亦能見到許多深富思想性、時代性特色的代表作。

《觀海集》除篇前的〈序〉、〈題詞〉及篇末的〈跋〉，其他卷次係依年度分為四部分，以下即依年度，並按各類型的詩體形式整理如下表：

年作品數 度註	第一：己酉下 一八四九年	第二：庚戌 一八五〇年	第三：辛亥 一八五一年	第四：壬子 一八五二年	合計
五言律詩	16 3	12 1	10 1	18 4	56 9
七言絕句	18 6	28 5	15 4	8 4	69 19
五言絕句				1	1

合 計	樂府詩	雜體詩	七言古詩	五言古詩	七言律詩
44 11	1		1	3	5 2
55 17	10 10	1	2	2	
34 7	1	1	1		6 2
51 14	2 1		4 1		19 4
185 49	14 11	2	8 2	5	30 8

上表各欄裡有兩個數字者，前者代表作品數，後者代表該作品含有「自註」的數目。（註四）

上表部分作品一篇不只一首的「組詩」則以實際的作品數目統計，如卷二〈臺海竹枝詞〉十首係一組組詩，上表係以十首來計算，若是「組詩」只視為一篇來看，則各卷的篇數分別為三十四、三十七、十七、三十三篇，總篇數則為一二一篇。《觀海集》除了第一卷有二十七首係在中國大陸所作，其餘的一五八首全係與臺灣相關的作品。

《觀海集》與《海音詩》

就詩歌形式而言，《海音詩》百首均是七言絕句（註五），而《觀海集》的形式除了有七言絕句六十九首，五言律詩與七言律詩之作爲數亦不少，雜體詩與樂府詩雖然只有十六首，但如卷二〈草地人〉、〈羅漢腳〉、〈大頭家〉等作品卻深具特色，它可以提供我們從不同的詩歌形式來研究劉家謀的文學作品。

就寫作時間而言，前面已指出《海音詩》係作於咸豐二

年夏秋之間，而《觀海集》係劉家謀在臺的詩歌隨筆。劉家謀病逝於咸豐三年夏季，而現存的《觀海集》並未見到這段期間的作品，我們由謝章鋌〈序〉開頭的一段話：

臺匪滋事，芑川力疾守陴，病，暑卒，至於今五年矣。棺歸遇賊，遺物盡失，而此一卷者棄擲絕嶠，浮沈風濤，竭力求之，久而後出，毋亦有神靈呵護之耶？

可以推測出兩個原因，第一個可能咸豐三年劉家謀生重病，又身歷民變故未隨筆創作詩歌，第二個可能是咸豐三年原有創作，只是在歸葬途中散佚了。

在作品的完整性上，雖然《海音詩》也有原刊本及連雅堂「按所詠事類重編一過」校本的差異（註六），不過兩個不同版本只是編次先後上稍有出入，但對《海音詩》本文的完整性則無疑義。可能因《觀海集》係劉家謀的遺稿，並非最後的定稿，故筆者檢視《觀海集》全文可以發現若干文意不連貫，可能是本來就留下的闕漏，如卷二〈贈雲裳〉第二首，倒數第二句「共君莫向□波望」，此句很明顯少了一個「□」字。

除了作者原來就留下闕漏之外，刊印的疏失也可能是影響《觀海集》作品完整性的原因之一，如謝章鋌〈序〉稱《觀海集》全部作品爲「一卷」，但在實際本文的編印上係按年度分爲四大類，己酉年下、庚戌年、辛亥年的作品分別稱爲「觀海集第一」、「觀海集第二」、「觀海集第三」，但壬子年的作品卻稱爲「觀海集卷四」，前後「體例」的不同明顯可見，這種誤差可能是刊印、校對時所造成的（註七），另外，也有可能原是未定稿，故在刊印時保留原來的樣式。詩歌的「自註」形式，在向來注重典雅特色的傳統詩歌

裡較少被列為論述重點，不過，就風土詩（或竹枝詞）而言，「自註」常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與詩歌本文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海音詩》百首，首首有自註，七言絕句本文形式統一，能較簡潔掌握描寫對象，而「自註」部分不拘格律形式，可靈活記敘鄉土民風。《觀海集》卷四〈寄筠川弟〉第二首：

半生萍梗命，一卷竹枝詞，差喜頑軀健，炎荒久亦宜。

觀其在臺之作，以「竹枝詞」為篇名者只有〈臺海竹枝詞〉十首，但此組作品所描述的主題與範疇只偏於一隅，不似《海音詩》描述臺灣風土的深入、廣泛，〈寄筠川弟〉所謂足為「立言安身」的「竹枝詞」應當是指《海音詩》百首，而非〈臺海竹枝詞〉（註八）。由上例可見，《觀海集》〈寄筠川弟〉可視為《海音詩》創作動機的自白，這是前人未曾發現過的新觀點。

而自註在《觀海集》所佔的比例不到全部詩歌三分之一，這是由於《觀海集》與《海音詩》創作意識的不同所致，故其自註不似《海音詩》百首均加自註。《海音詩》以描寫清代中葉臺灣風土，反映當時的社會實況做為創作主題，《觀海集》〈草地人〉等十首樂府組詩雖然也具有這種風格，故亦首首加上自註，不過，《觀海集》除了部分作品如《海音詩》描寫外在的客觀世界，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作品，可以讓我們更深刻看到當時文人離鄉背景，遠渡重洋，其內心世界如何自處，又如何面對外在的陌生世界，劉家謀在《觀海集》所流露的心聲可視為當時部分游宦文人如何看待臺灣的一個人物代表。

前面幾個部分，我們已從外緣角度論述《觀海集》，以

下吾人將分別就此書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及作者的生命歷程予以分析。

《觀海集》的客觀世界

《觀海集》所反映的外在世界大致可區分為兩類，一種是以客觀之筆描寫臺灣社會，這種記敘方式與《海音詩》的筆法相若，另一種方式是將自己生存時空的生命感受投射在外在世界，使作者筆下所描寫的外在世界也感染作者的內心情感。本單元先論述前者，而後者則在下一節續作討論。

就所反映的內容來看，固然《觀海集》有部分內容也見於《海音詩》，但兩者寫作的時間、筆法各有不同，亦有相互參照的作用（註九），況且，《觀海集》所描寫的主題有許多是《海音詩》未曾處理過的，更值得我們注意。

卷二〈草地人〉、〈唐山客〉、〈羅漢腳〉等十首樂府詩，其創作動機有如白居易〈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的新樂府精神，〈草地人〉言：「城中飽食但安坐，翻笑草地真蚩民。」反映城鄉與上下階層的不平等；〈虎老爹〉謂「胥役家多祀虎」，傳達官吏的貪得無厭；〈大頭家〉：「莫作大頭豬，豬大屠宰及；莫作大頭家，家大公私急。」透顯即使是富有的大租戶亦不堪官府長期的騷擾；〈童仆曲〉：「雖使飲醕且低頭」，表現當時一般民間迷信的普遍，寧信童卜卻不信醫生的現象；〈換臺兵〉：「時平不識戰與守，圍坐公廳但飲酒。……泉人惡漳漳惡泉」，抨擊當時在臺軍隊內部的糜爛與矛盾；〈赤腳苦〉：「縛脚歡樂赤腳苦：霜雪埋頭死無數」，對出身卑微的婢女寄予深刻的同情。至於〈唐山客〉所謂的「流連不思歸」，係寫唐山客流戀臺

灣，不顧樓頭少婦的夜夜思，而〈楊花曲〉恰如近代版的〈琵琶行〉，寫良人從軍唐山卻一去不回的哀傷。

《海音詩》對咸豐元年、二年冬春之交的澎湖大饑雖然亦有描述，但在情感流露與描寫篇幅上，《觀海集》則有更深入的反映，〈賣兒行〉：「一團並作異鄉鬼，不若生存賤賣之。……大兒未足小兒補，兩兒尚可一奈何？」道盡貧苦人家的辛酸，至於「恨不生子累累多」更是反諷之筆；另外，〈哀澎民〉四首及〈贈周光部維新明經〉對此次饑荒亦有深入的描述。至於〈奉陳星舟農壇丈〉則寫台米內運大陸，油糖失利，民益無聊生；〈鐵線尾婦〉則對澎湖小妾地位之低，淪為金錢買賣寄予深切的人道關懷與同情。

《觀海集》除反映較為悲慘、激烈的社會實況，亦記載頗多輕鬆趣味的風土民情，卷二〈臺海竹枝詞〉十首即是其例。而且，這組詩雖較《海音詩》早完成，不過所討論的內容卻大都是《海音詩》所未論及的，〈臺海竹枝詞〉敘及特殊的婚禮儀式、風物民情足有可觀之處，特別是其中四首作品論及原住民語言、風俗更足珍貴，如第五首的自註謂：

番未受室謂之貓鄰，又謂之貓達，專司鋪通卓機輪、鈴鐸之屬，又曰薩歧宜，佩之行則有聲。

這可能是劉家謀見到「熟番」的生活一景而予以記錄下來。由於《海音詩》是劉家謀用心甚深的創作，他必須在有限的一百首篇幅中，總結四年臺灣之行的所見所聞，以做為朝廷日後改善對臺統治政策的參考，故在討論的材料上須有所揀選才能含攝不同層面的風土民情，而《觀海集》係作者的生活隨筆，沒有篇幅的考量，故這段較為細節的記載反而見於《觀海集》的〈臺海竹枝詞〉，而不見於《海音詩》。

《觀海集》的社會反映

人類各項行為必須受思考的指導才能順利達成，這過程必然歷經各項判斷與抉擇，而在人文領域所謂絕對性客觀，不賦予情感是很難成立的。同樣地，上一單元「《觀海集》的客觀世界」及本單元「《觀海集》的社會反映」亦是就其相對的「情感性」而言，本單元所列大致可歸納出較富作者生命情感的作品。

滿清王朝領有臺灣一地之後，有感於當時海峽的風波險惡，許多地方都還處在待開發的狀態，官宦常視臺灣為畏途，所以自康熙以來即定下「三年一調」的規定，這項措施原是為鼓勵仕臺之人，但其利弊得失自郁永河《裨海紀遊》即有許多的討論，劉家謀也是在這項「三年一調」的規定下，在道光二十九年調任臺灣府訓導，在他的《觀海集》有許多篇章流露出客居異鄉的感慨，即使是回憶大陸的王朝或是時空感受也常感染這種情調。

臺灣由於是清朝新領之地，先前又歷經荷蘭、明鄭的治理，在政治上常流露反抗威權的意識；來自大陸原鄉漳、泉、粵各個不同地區的移民彼此為了爭奪資源也時出現分類對抗之事，故有「三年一反、五年一亂」之說；而在稍早之前，一向以天朝自居的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一役被英國的洋槍大炮威逼之下簽了南京條約，復加劉家謀在臺任職期間正值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滿清政權岌岌可危，來自內外諸種主客觀不安的環境都直接、間接對劉家謀造成衝擊。

以下數首詩的部分詩句可以看出他對政局不穩定所帶來

的諸種反映：

「酒酣慷慨談兵事，正是東南羽檄馳。」（卷一〈含

林獻雲樹梅廈門〉）

「兩粵兵戈尚未除」（卷二〈題獻雲叢記〉）。

「毒浪衝淮甸，驚烽暗楚庭。」（卷四〈感事〉）

當劉家謀看到皇帝「詔書頒罪己」，自己也不覺「伏讀涕猶零」，即使是心境較為坦然時，不免也興起感慨及無奈：「如何叱吒風雲客，絕島低迴但著書。」

劉家謀效忠滿清王朝的意識也反映在對明鄭的觀點上，他雖稱讚寧靖王妃「一時義烈滿乾坤」、「尚有紅顏識報恩」（卷二〈謁五妃墓〉），不過對曾正面與滿清政權抗衡的鄭氏王朝就帶有貶抑口吻：「偏隅需聖化，艾殺獨艱辛。」（卷二〈鄭延平郡王祠〉），這種肯定統治者的觀點或許是大部分在清廷任官必然採取的態度吧！

姚瑩、達洪阿於鴉片之役適任職臺灣，曾兩度俘獲英人，他們先前均受到清廷獎賞，後來在英人的壓力之下反受責罰，劉家謀透過〈薙髮匠營卒王姓爲余道達總戎洪阿舊事〉敘述達洪阿早年的逸事，這也可看做是他從側面對前賢所表達的幾分同情。

自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至同治六年（一八六七），這八十六年之間臺灣共發生民變三十三次，械鬥二十六次，共五十九次，平均一點四六年即發生一次動亂，可見當時情勢之一端（註十）。面對時局連年的不靖，即使是〈聽楊陶徑春書廣文譚火山之勝〉（卷三），本來是在談「水火同源」的天然勝景，卻附會聯想地氣關乎民風：「炎方習俗易浮動，都為精華太洩越。由來『地氣關民風』，所貴韶光藏樸

納。」不免也興起「令我憂時心硯硯」的感嘆，面對當時臺灣的政局，另一方面他也提出制止地方紛亂最爲根本之道是：「只應廉惠吏，安定息荏苒。」（卷二〈海東雜詩〉）而不全然如前面一首詩只是面對自然勝景興嘆。

不過，面對現實的社會動亂，他不得不也帶來許多感慨，特別是海路不通，最爲異鄉客所憂心，於是有詩句：「秋來路不通」（卷四〈秋來〉），「百貨難通亦可哀」（卷四〈秋日漫興〉），這種對於客居異鄉的各種生命感受與興寄必然非常的深刻。

《觀海集》的懷鄉意識

劉家謀《觀海集》客居異鄉的意識是此書最特別而又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他如何在遠渡重洋之後調整自己的心理，在困頓之餘又如何找到生命的重心，這是以客觀之筆寫臺灣社會的《海音詩》所見不到的，也是以往研究者討論《觀海集》未曾處理過的（註十一）。《觀海集》是劉家謀在臺的詩歌隨筆，它雖有反映歷史文獻的附帶價值，但歸根究柢我們更不能忽視它是文學作品，它在文學上所代表的意義，除了反映歷史社會文化之外，它所呈顯的作者生命型態更不容我們忽略，也惟有如此才不會忽視它的文學本色，而造成買櫝還珠之憾。

劉家謀是福建侯官人，他渡海到臺灣府任訓導一職，原本只有一水之隔，但當時海上交通的險惡遠非今日可比擬，這情景恰如他對臺灣海峽的描述：「海窮天作岸，風大浪如山。」（卷一〈舟中偶興〉）復加當時兩岸聯絡的諸種限制，不免使得他常興起客居異鄉的意識，在《觀海集》裡這類

型相關的作品為數並不少：

「來日光陰怎如飛，客中難度是斜暉。」（卷二〈來日〉）

「但恨遲遲歸」（卷三〈夢中作〉）。

以上兩詩是生活雜感中直接反映的懷鄉意識，而在日常生活各種人、事、地、物不免常感染這種情緒而表現於各類作品。

以下兩詩不難可以看到劉家謀獨對孤月不寐的情景：

「荒荒獨自明，懷鄉欲尋夢。」（卷二〈月夜不寐〉）

「獨抱秋心對孤月」（卷二〈含雲裳〉）。

看到候鳥的夜鳴，不免也讓他想到：「茫茫大海西，對影自酸楚。」（卷二〈海鳥來巢夜鳴不已〉）而卷二〈荔支自內地來而色香味變矣感喟不已〉：「百年在鄉好，……君看仙人姿，過海亦憔悴。」〈題尋梅圖〉「海外欲覓一枝難」，〈書郭雲裳秀才襄錦秋柳詩後〉「一夜歸心滿海東」，卷三〈庭前忍冬藤花〉「能消瘴癘侵，東洋誰伴汝。」〈春日即事〉「牢九登盤轉憶鄉」，以上諸詩分別藉由荔支、題畫、題詩、庭花、美景而寄寓作者渡海的孤獨與憔悴。

面對孤寂、不安，來自故鄉的家書或許可稍慰異鄉的劉家謀，所謂「客裡無他望，開緘意已舒。」（卷一〈得晟兒書〉）應當是最好的寫照，不過，這一點點希望也不見得都能圓滿達成，隨著烽火動亂的來臨，家書也可能受到阻隔，這種心聲也表達在他詩句：「二見天邊月，三經海上春。自憐身是客，……隔歲音書滯。」（卷三〈正月初七夜對月有感〉）更難過的可能是原本以為三年期滿就可調回大陸的美夢也難以如期達到，「三載期難收，重洋夢易迷。」（卷一

〈歲除寄內〉）表達了劉家謀對回鄉的強烈企盼，而「錯被虛聲歸計帶，瀛壖三載未抽身。」（卷四〈寄東洋諸同志〉）則顯現了他三載未歸的失望與難過。

面對一連串的困頓與挫折，或許，借酒稍可一慰遊宦者的心酸吧！

「浩浩何時還，……徒凋游子顏。」（卷一〈飲酒〉）

「莫惜千杯醉，還尋一枕安。」（卷三〈閏中秋夜醉後作〉）

這些詩句很清楚的傳達了作者內心種種的無奈，而必須以酒醉才能暫解異鄉之苦，但相對地，也許是長期客居異鄉而使他身心備受煎熬，生理上的病痛也就難以避免，如：

「客思無聊病又侵。」（卷三〈病中〉）

「旅病支偏苦，鄉愁撥不開。」（卷四〈病中不寐〉）

作者寫這兩首詩時只有三十八、九歲，在今日來看，年歲並不算太高，但這已漸漸走近他四十年生命的最後歷程了，傳統文人的悲哀於此可見其一端，特別是在時代動亂之中生命更是脆弱。所謂「都為斗升祿，難言骨肉情。」（卷三〈束陶徑諸羅〉）正反映這種無奈與心酸，而臺灣之行只是他的新愁而已，身心長期的勞頓應當更是他悲哀的源頭，下面詩句所謂的「十載」、「二十年」正深刻表達這種寫照：

「自言十載辛酸淚，宦海蹉跎又一年」（卷三〈酒後〉）

「廿年遇除夕，強半是離家。」（卷四〈凌霞閣守歲〉）

面對種種的挫折，他必須有所調適與因應才不致使他的心靈全部被異鄉意識所填滿，也唯有如此才能創作有益後世的《海音詩》，而由下一單元對《觀海集》的論述正可見到劉家謀努力向上的精神。

《觀海集》的心靈提昇

為避免營私鄉里，清代官制規定迴避制度，不可在自己籍貫地的行省為官，即使是學官稍有放鬆，但亦不准在同府任職，很顯然地這種異鄉任官的制度很容易引起游宦者的懷鄉情愫，劉家謀的懷鄉意識也無法自外於這種時代因素。不過，如果是因為自己心靈的困頓脆弱就尸位素餐，亦或隨波逐流，則其人實無足道哉，難能可貴的是劉家謀雖然身居末官，由《觀海集》我們可以看到劉家謀不但能突破既有的時空限制，調適自己的心靈，而且能夠奮發有為留下有用的《海音詩》采風作品，成為寶貴的歷史文獻。

在他克服自己心理障礙的歷程，他有效的善用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使自己在逆境當中得以安身立命，不為環境所限泥。但在《觀海集》他也曾感嘆：

「海外親朋少，回憶亦傷神。」（卷二〈送陳晴江遇清表叔歸里〉）

「鄉心寥落宦情艱」（卷二〈送林衡麓心鑑同年內渡〉）

即使是送別友人或是與哀悼故人都仍充滿許多無奈與辛酸（註十二），不過，由《觀海集》的三、四卷可以發現他在臺灣的第三、四年已能逐漸調適自己的心靈，並且也能發現臺灣風土之美，觀「天涯相惜汝偏深」（卷三〈口號贈韋鏡秋國樸秀才〉），「相逢可惜十年遲」（卷四〈口號贈王廉卿修業〉），這兩首詩均深刻地表現朋友之間的相知相惜，朋友之間的情誼對劉家謀心靈的安頓應當很有助益，這較之他早先「海外親朋少」的感嘆的確有很大的不同。

卷四〈韋恕齋廷芳明經招飲家園菊有花矣〉與朋友共同賞花，亦異於早先的孤芳自賞，所謂「今日始逢開口『笑』」的情境亦是以往少見的場面（卷四〈九日風雨吳雪堂尚霖招飲宜秋館〉），至於：

「海天對酒且陶然」（卷四〈養疴林永恬春瀾廬樓書以誌感〉）。

「宦久漸知人意好，飲多不覺旅懷開。」（卷四〈長至日飲食鍾白德琨秀才家〉）

在這些詩句當中可以發現他迥異以往而流露出隨意而安的生命情調，而不再與臺灣的時空環境格格不入。由卷四〈赤嵌子夜歌〉，我們亦可以看到他已能平心靜氣去觀察臺灣月夜的風光特色，因此他才會發出贊語：「郎家唐山天，無此好明月。」（註十三）

至於，早先他感嘆日常當中不識臺灣語言的困擾（卷一〈海舶雜詩〉「鄉語侏儻聽不得」），到了後來也都有很大的改觀，由「蠻語漸隨俗，常得通音信，何須怨別離。」（卷四〈寄筠川弟〉八首）雖然臺灣對他來說仍算是客居，不過，一方面他已能直接與本地人溝通，那分生疏感減低之後，自然有助於自我心靈的調適，另一方面也能將日常所聽到的口語寫入作品當中，更加深化采風的效果。

透過典籍的閱讀對智識的提昇很有助益，由卷四〈從周光邵借書讀綴此歸之〉亦可見其一端（「病臥秋風滄海上，一痕猶喜借書。」）；而詩文的研讀也可以擴展既有的視野與胸襟，卷三〈讀本事詞雜感〉「早識心安便是鄉」，詩句裡所謂的「鄉」已不再拘泥有形的「故鄉」，而是直指心靈平安之「鄉」，可見其心靈的調適亦擴大了故鄉的概念。

我們也要特別再提到卷四〈寄筠川弟〉八首，先前已提過此組詩反映他對臺灣語言的逐漸熟諳，而且他創作《海音詩》的用意是爲了「猶足見興情」，以免「空桑留宿意」，雖然，對劉家謀而言他依然是臺灣的「過客」，但他已不再怨嘆仕途的無常，也不願只留下生命的空白（註十四），他忠於自己的生命，努力搜集文獻資料，並結合在臺的所見所聞，創作《海音詩》爲我們留下一份擲地有聲的風土文獻，而由《觀海集》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力求上游的可貴精神，這是上承郁永河《裨海紀游》、孫元衡《赤嵌集》、夏之芳《臺灣雜詠》、張湄《瀛壖百詠》、朱士玠《瀛涯漁唱》以來實是求是的采風傳統（註十五），並且延續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對清代咸豐光緒的鄉土采風產生一定的正面影響。

經由對《觀海集》及《海音詩》相互的解讀，讓我們更清楚了解劉家謀的爲人。在那紛亂的時局當中，他能不隨波逐流，不論是有形的文獻采風，或是無形的奮鬥精神，他的諸種努力已爲我們留下很好的風範，所謂「典型在夙昔」，或許也可以用來形容劉家謀吧！在一片注重鄉土文獻的今日，面對本土化的諸種呼籲，他在語言、風土所下的努力，由挫折困頓到心靈提昇，劉家謀也是一個足供我們參考、注意的人物。

【註 釋】

註一：韋廷芳〈序〉見於《海音詩》本文之前。此篇所引用的《海音詩》係依連雅堂校本，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四十七年十月。

註二：參黃淵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藝文志著述篇》，二〇

八頁，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八十二年一月。

註三：大陸出版的《臺灣文學史》曾謂《觀海集》、《海音詩》在創作時間上係「互相銜接」，這個觀點頗值得商榷。兩書的創作方式及意識不但不同，而且由《觀海集》最末兩首詩歌〈歲暮偶成〉、〈凌雲閣守歲〉，一看其篇名就可知道是作於《海音詩》之後，謂《海音詩》是「銜接」自《觀海集》顯然有欠周允，參劉登翰等編，《臺灣文學史》（上卷），二一六頁，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

註四：上表中的「雜體詩」係指該首作品每句的字數不一，有五、七言相間的形式，卷二的〈早兩月矣見村農入城祈雨者〉及卷三的〈閏八月九日，率成長句〉兩首即是其例。卷一的〈義虎行〉若就每句詩句的形式來看，當屬七言古詩，卷三的〈楊花曲〉，卷四的〈賣兒行〉，若依詩句每句形式當列爲雜體詩，但在傳統詩歌史上來看，此類詩歌襲用樂府古題大都被歸類爲「樂府詩」，此處亦將之歸類爲「樂府詩」；卷二的〈草地人〉、〈唐山客〉、〈虎老爹〉、〈羅漢脚〉、〈大頭家〉、〈換臺兵〉、〈童吓曲〉、〈鴉片鬼〉、〈珠母孫〉、〈赤脚苦〉等十首，卷三的〈鐵線尾婦〉亦有如白居易〈賣炭翁〉、〈新豐折臂翁〉即事命題的新樂府精神，亦將之歸類爲「樂府詩」。

註五：此是依韋廷芳〈序〉的觀點而說《海音詩》作品屬七言絕句。不過，傳統上也常有不少的文人除了就文學類型看風土詩（或竹枝詞）之外，並考慮風土詩詞語俚俗、不求典雅的文體特色，常將風土詩與七言絕句予區別，並分析其不同的文體「本色」。參翁聖峯，《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清代臺灣竹枝詞與七言絕句的關係），一三五頁，臺北，文津出版社，八十五年四月。

註六：同註一出處，參周憲文〈弁言〉。

註七：又如卷一〈居東洋畜一大既歸遺之不去〉，篇名中的「大」字當爲「犬」字文意才能連貫，這可能亦是刊印疏失所造成的。

註八：「爲何百首《海音詩》篇名不以竹枝命名，卻又可以視爲竹枝詞？」事實上，這種以詩歌本文的特色而稱七言絕句體的風土詩爲竹枝詞者在清代不乏其例，參翁聖峯《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清代臺灣竹枝詞風格類型的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八十五年四月）。

註九：例如，〈臺海竹枝詞〉第一首與《海音詩》第十五首雖都反映俚諺「澎湖女人，臺灣牛」，不過，〈臺海竹枝詞〉寫作「臺牛澎女總勞躬，八單何須羨媽宮，至竟好公誰嫁得，年年元夜學偷葱。」此處側重在寫澎湖傳統的民間信仰，而《海音詩》寫爲：「真教澎女作臺牛，百里饑驅不自由，三十六村歸未得，望鄉齊上赤嵌樓。」此處則重在反映澎湖因饑荒而賣子的慘況，可見，兩者的描寫對象雖相近，但所反映的重心則大爲不同。

註十：參楊碧川，《臺灣歷史年表》，三十一頁，臺北，自立晚報出版部，七十七年六月。

註十一：參註四引書，二二三頁至二一九頁。

註十二：《觀海集》關於送別或哀悼的詩歌常感染作者的種種生命感受。如「邊識當塗識音寡，……謂我冷署毋羈留。」（卷三〈酒邊同黃希叔惠元話別〉）「若過吾廬便，爲言遠客安。」（卷四〈送章鏡秋問西國琛兄弟應省試〉）「詎容滄海外，猶戀腐儒餐。……功名方蹇滯，生計更艱辛。」（卷三〈得旭軒兄春暉計經年矣屢欲哭以詩一把筆輒心痛不止秋窩枯坐率成四章不知是字是淚〉）

註十三：參卷四〈赤嵌子夜歌〉：「初二魄已生，廿八光未沒，郎家唐山天，無此好明月。」（自註：臺灣初二夜即見月，至廿八

日殘月尚高，凡二十八夜皆見月也。）

註十四：藍鼎元《論臺中時事書》曾批當時有的游宦者：「當愁醉濃，當饑飽鮮，囊帛贖金，笑與秩終。」轉引自註十引書，四十九頁。

註十五：有關竹枝詞（或風土詩）與清代臺灣方志采風的關係，可另參註五引書，四十七頁至七十頁。

（編按：劉家謀《觀海集》正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重新標點編印中。）

作者簡介

翁聖峯，52年7月生於彰化，現居板橋。

一、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肄業。

二、現爲輔仁大學夜間部共同科講師。

三、其他重要論文：

（一）《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文津出版社（85年4月）。

（二）論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之研究不宜偏廢（《臺灣文學觀察雜誌》第8期，82年9月）。

（三）下層社會的見證——試論宋澤萊的「蓬萊誌異」（「第2屆臺灣經驗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82年11月）。

（四）試論連雅堂的「墨子觀」及其相關問題（《臺灣文獻》第45卷第3期，83年9月）。

（五）《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敘》析論——就五四以來的相關論爭入手。（《輔大中研所學刊》第6期，85年6月）

